



世纪文库

多桑蒙古史

上

[瑞典] 多桑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多桑蒙古史

[瑞典] 多桑 著 冯承钧 译

上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多桑蒙古史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多桑蒙古史

上册

序 一

一部《元史》，历来囿于“正史”成见的人皆说不好，所以陆续改编了些“续编”、“类编”、“新编”、《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这部历史好像是犁然大备，其实不然。修史首重在搜辑史料，而修元史尤须要通晓几种外国语言。不解外国语言，不但不能搜辑外国史料，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更有进者，外国语言不可偏重一种，像现代有些人认定除英语外无外国语的例子，是不对的。《译文证补》就犯这种毛病。此书虽然引用了许多“西域书目”，好像他是全凭译人口述而“笔受”的，不仅未见波斯语、阿剌伯语种种撰述，而且多桑的书好像也是从霍渥儿特(Howorte)书转录的。洪氏证补《元史》之功固不可没，可是他有一种成见误人不浅。他说西方语言无某音，不及汉字译音之备。此说很不可解。若说用标音字母译写的名称，不及音义有变化的汉字之备，未免很奇。他在《译文证补》里面，根据译人的口述，改了许多《元史》固有的地名、人名。比方《元史》译 Heri 作“也里”，《元朝秘史》作“亦鲁”，皆有译例可寻。可是洪氏根据晚见的 Herat 译作“海拉脱”，似乎只知其一不知有二了。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这种创译，苦了后来续修元史的人。所以《新元史》的阿儿浑，在此人本传中作“阿儿浑”，而在《旭烈兀传》同《西域传》中又作“阿儿衮”。这种毛病皆是不能径读西书所致。

所以我想将多桑这部《蒙古史》翻译出来。此书虽有一百多年，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仍不能不拿来参考。因为《世界侵略者传》、《史集》、“瓦撒夫书”等书没有完全译本以前，终不能不取材于是书。案：多桑书共有七卷。前三卷述成吉思汗至元亡时的事迹，后四卷专言伊儿汗国的史事，并附带言及钦察、察合台两汗国。其第一卷

业经田中萃一郎译为日文，译文尚还忠实，可是有许多人名、地名未取元代载籍的固有译名比对，第二、第三两卷记成吉思汗以后之事，然多取材于中国史书的译文，所本的汉籍。以《续通鉴纲目》、《元史类编》两书为最多，偶亦采用《元史》。然而于《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皆未引用，当然说不上《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同元人文集中的许多碑志、行状、家传了。所以我译此书，先从后四卷译起，将来如有余暇，再译比较西方材料较多之第二卷。

多桑书所本之书有二三十种，也有人名、地名不统一的毛病，尤其使人讨厌的，就是他叠床架屋式的译写方法。然而也无可如何，不借用新式译写方法将他改正。霍渥儿特书第四册的索引译写比较简单，可以取来对照。

我原想用白话翻译，不用“史书文体”，可是渐渐不知不觉地受了史书文体的支配。然而我始终力避用“典”。我的目的惟在将此书原意译出，供他人作史料参考之用，所以对于译文只求忠实，不去锻炼字句。在别人看起来，我译的这部书或者比从前的译文退步，然而我觉得译文通畅的地方，容或有点削足适履；文义滞涩的地方，容或确可比对原文。所以宁愿拖泥带水，而不愿钩章棘句。

从前编纂元史的人，除开屠寄以外，皆有译名不一贯之病。所以我在翻译中，对于人名、地名，颇为审慎。凡人名、地名皆以《元史》、《元秘史》两书为主。两书所有的，选用一名。两书所无的，地名一项，尽先采用唐、宋、明人的译名；人名一项，元代载籍中有同名的，如帖木儿、不花、阿里、忽都不丁、阿合马、亦思马因、阿剌丁、马合谋之类，虽非本人，亦用旧译，元代载籍中无可比附的，则务求合乎元人的译法，不敢以今人的读音认作元人的读音。元人的译法在不明语学的人看起来，好像不对。比方将-l读作-n就是一个例子。殊不知这种代替方法，从前也有，而在元代竟成一种通例。所以译sultan作算端，Djelal-ud-din作札阑丁，Iltchikadai作宴只吉带。这皆是翻译本书所用的正例。然而有时因为下述种种理由，不能不用

变例：

元代除开一个最短期间用八思巴字母外，始终用的是畏吾儿字母。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 g-、h 的字母，所以蒙古文中多缺此种写法。唐时突厥语的莫贺咄，移植到蒙古语中，应读若 bagatur。可是在蒙文《元秘史》中写作把阿秃儿，则成 ba'atur。在《元史》中更简作拔都鲁，则成 batur。又一方面，阿剌伯字母中不常著录韵母，所以有许多名称写法不一。姑就此把阿秃儿一字而言，本书竟有写作 Behadir 者。我当然不能按着字面翻译，而将它改作八哈都儿。此变例一。

回教人的名称，无所谓姓，加之名字相同，要使许多同名的人有别，所以在名后加一别号，如用职务官称之类。再不能判别，则于名后注某人之子，如 Ibn Ali 犹言阿里之子之类。或者还要加上一个地名，如报达人术外因（就是《译文证补》的志费尼）人之类。然而也有无从判别的。所以我将这类的译名，略为变通。如《元史》中的 Argoun，是种族名，是军名，亦是人名。《元史》为判别这些名称，将它写作阿儿浑、阿鲁浑、阿里浑、阿剌浑几种写法。我也仿照这个例子，皆分别著录原文于下。可是也有不能分别的地方。本卷中有三个秃儿罕可敦（Tourkan Khatoun），究竟是二人是三人，无从知之。此种名称只好用一贯的译法。此变例二。

本卷中有些译名，看起来好像是变例，其实是正例。比方钦察汗国侵入波斯的统将名唤 Nogai，《译文证补》将此名译作诺垓。其实此名也是蒙古时代的一个通常名称，与他同名的人，在《元史》中颇不少见。我们姑将《元史》的译例来解说。《元史》（我所指的当然是未遭乾隆校刊劫的《元史》）定宗后名唤斡兀立海迷失，就是西书的 Ogoul Gaimisch。可见海字对 gai。蒙古人的官号 Noyan，在《元史》中写作那颜、那演、那衍，可见那字在元时读若 no。对照起来，Nogai 应该译作那海，而不应改作诺垓。这类例子很多，姑举其一，以概其余。

还有些译名，可以说是正例，也可以说是变例。旭烈兀有个儿子，在此书中（第五卷）写作 Coungcouratai，《译文证补·阿八哈补传》

写作“空库鞞台”，《蒙兀儿史记·世系表》作“空古鞞台”，《新元史·旭烈兀传》作“空古鞞儿”。然在《台古塔儿传》又作“康康而拉台”，其实皆被多桑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所误。案：元代的蒙古人，常用些部族名称作人名，仅在后面加上一个接尾词，大概男名加“台”，女名加“真”。这些用部族名称而自名的人，并不是本部族的人，比方南家台或囊加歹，并不是中国南方的人，马扎儿台也不是匈牙利人，乃蛮台也不是乃蛮人，不过取其名而已。此处的 Councouratai 也是此例。多桑所取的材料来源不同，写法因之有异。其第一卷后附注所引《史集》诸部族名，有 Cuncarat，就是此人名之所本，也就是《元史》所常写着的“弘吉剌”。此名在《辘耕录》中作“瓮吉剌”，在《辽史》、《金史》中作“王纪剌”、“广吉剌”，用新式写法，应作 Qongirat 或 Ongirat。头一字何以有时用声母，有时不用声母，我现在还不能答复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拿畏吾儿字母来解释，因为辽、金时代蒙古人还未用畏吾儿字母，可是第二个字的韵母在汉译皆用 -i。所以我将这个人名更正为“弘吉剌台”。这个译名初视之好像未遵原文，其实我有我的理由。

本书有若干地名，我明知有误，然而未能确证其误以前，只好随它。比方旭烈兀进攻木剌夷时，有个地名作 Khar。按照霍渥儿特《蒙古史》所引 Quatremère 译本《史集》，此地名是 Khowar，则即是《元史·西北地附录》之“胡瓦耳”。然而我不敢改正，仍然译作哈儿。又如本书中之若干地名，似乎应该“名从主人”，不应用欧洲语言的名称。比方埃及不应名曰埃及，而应名曰密昔儿 (Misr)，美索波塔米亚 (Mésopotamie) 应改作 Djézireh。可是我是译书，而不是在考订，所以也不便改它。然而有时也有点变例。阿剌伯语名阿母河曰 Djihoun。此河元代本有阿梅、阿母、暗木等译，所以我习用旧称，不用新译。本书称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 Transoxiane，原意犹言“乌浒水外”。译用这个名称，未免太僻。若用康居的名称，未免太古。元时在此地设阿母行省，可是这个行省所管的区域，好像在最初时西及波斯，东兼

《元史·西北地附录》之“途鲁吉”(Turki),不能将这个名称代表两河之间的地域。考此地阿剌伯语之原名作 Mavera un Nehr,此言河中,西辽时于其地置河中府(见《湛然居士集》及《西游记》)。我所以将此地译作河中,其地既在西域,决不致同蒲州发生混解。

译名一贯之重要,取下面所引的一段《新元史》观之,就可知道了。《新元史》卷二五六(一二页)云:“西里亚,埃及属国,以他木古斯为都城。埃及与蒙古隔绝不通使命。宪宗初,西里亚酋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后为埃及苏而滩哀倍克所败,纳昔儿乃割基纳斯列母克渣及纳蒲列斯海岸以请平。”案:此处的“他木古斯”同“塔木司古司”,明明是一个地方,不知为何用两个译名。此城就是我所翻译的大马司。此城古称同现在英文仍旧袭用的名称,固是 Damascus。然而我只能从原书法文名称之 Damas 而译作大马司。

《新元史》的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就是多桑书的 Nassir Salah ud-din Youssouf,我翻译的纳昔儿撒刺丁亦速甫。《新元史》的译法,除开“商”字外,尚可勉强对付。可是后面的“基纳斯列母”,要叫元朝的人读起来,势须作 kinasremou,同多桑书的 Jérusalem 未免相去太远了。况且这是基督教人的圣地,通常译作耶路撒冷者,不知为何发生这样的讹译,大约是翻译的人太无史地常识,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对原文所致。由这一方面看起来,可见修元史不仅仅要通晓与《元史》有关系的若干语言,而且还要抛弃中国字古今读音不变的成见。其实我于此道不敢自认高明。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译写的蒙古文《元朝秘史》刊行后,考究元代的读音,再就考究的结果,来整理元代载籍的译名。哪晓得等待了十四年,除开片段的发表外,全书尚未出版。所以于译此书时,不敢自认译音之必是,将所有的人名、地名皆附注原文于下。然不能遍注,只以初见者为限。有时一名两三注者,或因原原有详有略,或因一名写法两歧,或因前后文相距太远,所以一再著录。

读者还要注意的,不仅多桑书所著录的名称不一致,或有误写而必须考订的地方,而且它所本的史料,也不免讹夺。现在姑举一例来

说。《史集》记载从大都赴上都的道路有三，第二路经过一城名曰 Djodjou，此城附近别有一城名曰 Simali，后一个名称就是长城附近的洗马林堡。可是 Klaproth、Yule、Blochet 诸人皆说前一地是涿州。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将就，在地理方面可就难了。现在从燕京（读者恕我不用这个很不祥的北平名称）到多伦西北八十里之古开平府，何致于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几十里的涿州，足证刺失德（Raschid）书传抄有误。伯希和在《亚洲报》（1927年刊）说是抚州之误。这种考订是不错的。可见不仅读多桑书要审慎，就是读他所本诸书的原文或译文，也要审慎。本卷中所言的狮符，明明是虎符之误。新修元史的人过于重视西方载籍，常将虎符改作狮符。然则《元史·兵志》“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的记载，竟成狗矢了。

本书所引诸书，皆用省称。因为在第一卷卷首已有说明，所以不赘。我的译文既从第四卷起，故将诸书目简单著录于后，以明出处。原书可惜无索引，将来如有余暇，容或补加于全书之后云。

1933年6月1日冯承钧识

序 二

多桑书共有七卷。我前以为西域三大汗国的史事在旧籍中颇欠缺，在新编中亦多疏误，故先将后四卷译。后来看见田中萃一郎所译的前三卷，我又觉得全书仍有翻译之必要（田中的译文我在《大公报·图书副刊》第十四期中已有评），遂又将前三卷转为汉文。翻译时间既有先后，前三卷同后四卷的译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比方 Mohammed 先译作谟罕默德，后在前三卷中概从唐译作摩诃末，就是一个例子。全书译竣，我想将后四卷取回整理，不意原稿清样统已制成纸型，势须大加挖改，末后只好听它，拟在索引中去补救。前三卷有新式标点，后四卷无，也是因为这种关系。

我从前在第四卷序中说过，多桑书同《元史》一样，也有译名不一贯的毛病。因为他所本的伊斯兰教撰述，文字不著韵母，而声母音点有时脱落，常易相混，所以不特相近的韵母有时误用，甚至难于互用的韵母，也能混淆不分。声母之误如果无他书可以对勘，竟至无法考订。比方主儿勤之误作 Bourkines，错了一个声母，那牙勤误作 Boucakines，竟错了两个声母，一个韵母。他最使我感困难的，就是对于 c、k、g、kh、gh 等声母毫无分别，例如他译写的 gan，对音可作干 (gan)，又可作坚 (gän)，且可作罕 (ghan, khan)。这种困难有时还可以用前后文去补救，例如 Togan，不难认识是脱欢。可是他有时又将 o 同 ou 两个韵母互用，写作 Tougan，则未免使人犹豫不决，因为蒙古人也有名唤秃坚的。像这一类的困难不计其数，我自信尚未能完全将它解决。

此外有些译名，好像与对音未合，其实不然。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证过若干变例，比方将 -l 读作 -n，畏吾儿 字母中无代表 g、gh 等声的字母，就是两个大变例。此外尚有若干为前序所未及的，条列

如下：

突厥语发音之 y，在蒙古语中常变作 j。此方突厥语驿站作 yam，蒙古语改作 jam。突厥语法令作 yasaq，蒙古语则改作札撒黑(jasaq)。讹答刺城的守将、杀成吉思汗使者的那个人，刺失德书名亦纳勒出黑(Yinalčuq)，号哈亦儿汗(Qayir-khan)，而在《元史》则作哈只儿只兰秃(Qajir-Jinaltuq)。除以蒙古语语尾之-tuq 替代突厥语语尾之-čuq 外，两个 y 皆变作 j，一个 l 变作 n。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蒙古语同西域语常将 b 变作 m，若乞卜察黑(Qibčağ)之变作钦察(Qimcağ)，哈卜哈纳思(Qabqanas)之变作憨哈纳思(Qamqanas)，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

蒙古语对于发音之 r-，常叠用其后之韵母，比方 Ros 之作斡罗思(Oros)，Riazan 之作也烈赞(Äräzan)，也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这种译法同古译相反，比方《宋高僧传》卷三有阿尔真那(Ratnacina)，竟将发音的 R-简单删了，大约是汉语同蒙古语无此发音，所以读音或增或减。

发音之 A-有时省略，比方 Abu Saïd 之作不赛因，Abu Bâkr 之作丕别，是见于《元史》的变例。可是也有帖木儿的后人 Abu Saïd 在《明史》中写作卜撒因的。看这个例子，足见收声之-d 偶亦变作-n。但是这种变例的收声不常见。

蒙古语尾之-n 增删无常。若阿勒赤(Alči)亦作按陈(Alčin)；河西转为合失(Qaši)，也可变作合申(Qašin)；月忽难(Yohunan)又可作月合乃(Yohuna-i)，这个月合乃在《元史》卷一三四误作月乃合，诸本《元史》皆然，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实作月合乃，这个名称大概也是从突厥语转贩而来的，在蒙古语中则变作术忽难(Juqunan)。

蒙古语常读 t 作 d，比方将 tarqan 读作答刺罕，将 tair 读作答亦儿，就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这种读法好像不是蒙古语所独有的，从前汉译 tarqan 曾作达干，Turkiit 曾作突厥。

上面所说这些变例，不但是译多桑书所应知道的，就是读《元史》

也是应该知道的。至若我所用以译写的汉字，我很想适合当时的读音。因为翻译非汉语的人名，固然要求一贯，可也要注意当时的读法。我曾说过，如要整理《元史》译名，必须兼具几种条件：一，要名从主人；二，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三，要明白汉字的古读，尤要知道元人的读法。从前整理元史的人，好像多未兼具这三个条件，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离不明。比较以前的整部成绩，只有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微合第二第三条条件，可是他常将《元朝秘史》的译音译写近代西文地名：将契丹改作乞坛(Qitan)，还可以说是乞塔惕(Qitat)的单数；将波斯作珀儿昔阿(Persia)，也可勉强对付；可是将埃及作额只魄惕(Egypte)，而不用名从主人之例，作密昔儿(Misr)等类的译法，未免过于刻舟求剑了。但是比较其他改修的《元史》，总算强多了。现在学界种毒最深的，要首数《元史译文证补》的译名。洪氏丝毫不问上述的三个条件同元代译名的那些变例，对于《元史》名称妄加改窜：比方译 Catchoun 作哈准，而不用元译的合赤温或哈赤温；译 Noqai 作诺垓，而不用《元史》屡见不鲜的那海或那怀。自以为新，其实错了。古人翻译，很明了汉字的读音，比方《圣武亲征录》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将，译名作三木合拔都，后又作三合拔都，此人的原名是 Samuqa Ba'atur，翻译的人用“三”（古读 sam，今粤人尚作此古读），照顾到第二个字的发声。这种译法就是从前佛经的译法，也就是《元朝秘史》的译法，不像今人随使用本人乡土的方言，同似识非识的汉字，译写外国语言名词之乱。所以《元史》中的译名虽不统一，除开过于省译之名称外，皆不难复其原名。至若《元史译文证补》一直到《新元史》的译名，能够还原的恐怕很少。

我所用的标准译字，多从《元朝秘史》，然而并不认定《元朝秘史》是一部完全不误的译文，其中也有些传写的错误。比方将你沙不儿(Nišabur)写作亦薛不儿(Isäbur)，将亦剌合(Ilqa, Ilaqa)写作你勒合(Nilqa)，可以说是音点不明，致有此误。可是杀乃蛮王子古出鲁克(屈出律)的地方作撒里黑昆(Sariq - qun)，证以近来发现的蒙文《秘史》残

本，实是撒里黑豁勒(Sariq-gol)之误。如此改正方与蒲犁县之土名相合。这类版本的错误，《秘史》中尚有不少，所以我虽采用此书，可不绝对盲从。

旧译名除开过于省译的名称，像忽亦勒答儿(Quildar)《元史》作畏答儿的例子外，我皆尽量采用，决不自出心裁，妄易新翻。元代载籍所无之人名、地名，而有旧译者，则用元代前后之古翻，如隋、唐之范延，《明史》之帖必力思之类，亦不别用新名，不用今读之字译古名，也不用古读之字译今名。凡原名初见者，皆附西文原名于下。可是对于多桑书所采乾隆时妄改的名称，根本既有错误，西文译写之名除不误者外，概从删弃。好在多桑书的精华全在回教著作，他所转贩的那些汉籍副料(以《续通鉴纲目》为最多)，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整理。

多桑书所引刺失德书很多，而刺失德书同《圣武亲征录》并出一源。在刺失德书未直接转为华言以前，我觉得多桑书是一部很好的参考史料。比方《亲征录》所载木华黎率王孤、火朱勒、忙兀、弘吉刺、亦乞刺五部以及契丹、女真之兵南侵中国一文，其中的火朱勒部，久之未详其对音为何，今观多桑书，知为 Qošiql。然则《亲征录》原译或是火失火勒矣。刺失德书(Berezin 本数见此名)说是每十人队中挑选二人组织成的军队，此说颇类真相，因为此字的字根是 qos，突厥语犹言双也。此姑就以多桑书校正中国史录而言。反一方面说，也可取中国史料校正多桑书。兹举一例为证：多桑书第一卷第二章有个部落，名称曰亦勒秃儿斤(Ilturkine)，后在附录中亚部族表中，又作亦勒都儿斤(Ildurkine)，检《元朝秘史》卷六相对之文(叶本三十一页)，王罕有个使臣名亦都儿坚(Idurgän)，后(四十九页)同一人又作亦秃儿坚(Iturgän)，也是一名两种写法，姑不问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要可以《元朝秘史》的名称改正多桑书之误。

我译多桑书时，很想作一种互证的工作，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可是费时也很久。如此做下去，恐怕几年也译不完，后来只好译而少证。